

譚嗣同年譜

楊廷福 著

K8

楊廷福著

譚嗣同年譜

譚嗣同年譜

楊廷福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73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4 $\frac{1}{8}$ ·字數71,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300 定價(7) 0.36元

統一書號 11001·154

封面設計者：牟業東 校對者：杜效之等

目 录

序例·····	一
年譜前編·····	二
生平簡历·····	二
家世和家庭·····	三
附譚氏世系表·····	七
年譜·····	八

序 例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榨之下所产生的戊戌变法运动，它代表当时士大夫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革命进步意义的。而譚嗣同是其中杰出的活动家，抨击封建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最激烈的一位战士。

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的局势直接刺激和影响下，譚嗣同在思想上由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而发展为反满，由反满而同情太平天国革命，进而憧憬于法国大革命，大声疾呼「彼君之不义，人人得而戮之」，「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而无憾。」〔仁学〕卷下，尤其他在变法运动中始终坚持着勇猛的实践，發揮了从容殉难的精神；不但是一位忠实于自己理想的人，而且有些地方已超越当时改良主义的范疇，相当接近于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

譚嗣同生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加深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历史研究〕第六期，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他吸收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識和十八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論的观点，同时又受到了中国自「易經」以及王充、張載、黃宗羲、王

夫之等學說的影响，初步建立了他具有唯物論傾向和辯証因素的哲學觀點；在当时政治實踐上，一方面打击了封建地主階級分子拒絕與新事物接觸的愚昧保守思想；一方面否定了封建社會束縛個人自由發展的森嚴秩序，提出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觀點。他進而大力抨击封建社會「黜奢崇儉」的傳統經濟觀點，熱烈贊揚西方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極力鼓吹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生产方式。他這進步的一面，正是当时新兴資產階級迫切要求取得政治地位，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窒息，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反映。并且譚嗣同把這種哲學思想作為武器來運用，這就使它更富有積極的戰鬥的實踐意義。

然而由於历史社會条件的限制，更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先天的弱點——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千絲万縷的联系；譚嗣同本身所受到科學水平的限制以及家庭出身、周圍人物和傳統學術思想、佛教、耶穌教的影响。以致在他的思想里充滿了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証的因素和形而上学的觀點，革命和改良，科學和宗教，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对帝國主義幻想等等进步的、落后的和反動的諸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决定了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担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在文化上正如它在政治上、經濟上一样，是不能完成历史任务的；同样由於这些局限使譚嗣同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偉大力量，不能丟下改良主義的沉重包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

民主革命战士。不过他救国憂亡的念头却好似烈火焚燒而不能戢一样，在徬徨憤懣之际，不覺为康有为維新的旗帜所鼓动，于是一誤于君主立宪的空想，再誤于載湉的倚任。就使他一腔热血，遂不洒在他所衷心隱含的民族革命的主張上，轉以酬报載湉的方式演出戊戌变法中一幕最慘痛的悲剧。

尽管如此，在資產階級革命运动行將出現的历史条件下，譚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不但「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給后来資產階級革命以有力精神上的武器，对資產階級革命尽了前驅作用」。〔毛澤东选集，第六二〇頁〕，特别是他敏感于民族危亡，努力探索着拯救中国的道路，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了偉大的爱国主义特色。他把生命献給了他所热爱的祖国，用鮮血鋪下了他所渴望的道路，也直接激励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杰出战士如鄒容（字威丹，四川巴县人）、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秋瑾（字璿卿，浙江紹兴人）等人的言論思想和行动。因而譚嗣同的思想学說成为維新运动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最杰出的一个；不愧为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啓蒙思想家、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近代唯物論的先驅者。

戊戌变法虽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譚嗣同慷慨悲歌地牺牲在封建統治者的屠刀

下，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却日益熾烈，一九〇〇年即有人民自發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革命运动的产生，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統治者和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狂妄企圖。同年还有譚嗣同的朋友唐才常所領導的自立軍企圖在長江起義。五十一年后，新中國的誕生，証明了毛主席一九三九年所說的「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六二六頁的真理。毛主席指示我們：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总结，承繼这一份珍貴的遺產。这对于指导当前的偉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二頁

通过譚嗣同一生的活动，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本質以及资产阶級思想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历史意义。当国际資本主义已經步入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时，只有無产阶級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同时又使我們通过历史事实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国人民今天所取得的偉大胜利，是經過了極其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的。現在我們正在胜利地建設震撼历史的社会主义正义事業时，为了更热爱当前革命的果实，更好地發揚爱国主义精神，我們緬怀

这位在黑暗中摸索救国真理勇敢的先驅者，将作为一份珍貴的遺產不断地来批判地吸收和發揚他的思想學說中唯物論和民主主義的進步成分。

遺憾的是譚嗣同誕生到現在已有九十一周年了，殉難到今亦有五十八周年了，海內學者，大家習讀他的著作，却沒有人給他做一部詳實的傳記，就是連一部詳細的年譜也沒有。雖然在戊戌以後由譚嗣同的朋友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替他做了一篇傳，其餘的像「清史稿」卷四七〇的「譚嗣同傳」，蔡元培的「譚嗣同傳」，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六編蕭汝霖的「譚嗣同傳」，碑傳集補卷十二「瀏陽烈士傳」，費行簡（沃丘仲子）的「譚嗣同」，近代名人小傳胡思敬的「記譚嗣同」，戊戌履霜錄卷四等，有的只是根據梁啟超的「譚嗣同傳」而寫，有的系掌故式的、一鱗半爪的記載，有的觀點立場是有問題的，都很难傳達出譚嗣同真正的面貌來。一九二五年文明書局印了一部「譚瀏陽全集」，前面有一篇陳乃乾先生的「譚嗣同年譜」，但僅根據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和譚嗣同的「三十自紀」分年排列一下，委實太簡略了。

要寫成一部好的傳記，除了應正確的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外，首先必須要組織豐富的信實史料，然後才談得上以生動整潔的文字加以敘述。廷福限于水平故先為輯「譚嗣同年譜」，然而限于年譜的體例，難免流于機械、枯澀、編年紀事和摘錄史料的形式。

替古人做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除了以事系年外，最好能够系統地看出譜主的理論活動和實際活動的發展綫索，同時由一個人進而了解他周圍的一些人物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經濟情況乃至國際大勢。章學誠「韓柳年譜書后」說：「年譜之體，仿自宋人，考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人之出處進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作者不揣淺陋，年來根據了譚嗣同全部著作，搜集和整理了有關戊戌變法的一些資料，依照年譜的體例，按年排比，除了對「仁學」的思想內容略作分析外，一般均以記錄為主，借供編寫譚嗣同一生詳細傳記或追述戊戌變法歷史的學者，作進一步的批判、整理、研究。

茲將「譚嗣同年譜」的體例說明如下：

一、年譜次第事實都以譚嗣同的著作為根據，凡譚氏的生平行誼，見於他人著述的，略加考訂亦予以搜集注明。

一、年譜紀年之下，兼注明歲次甲子和譜主的年齡。為了眉目清楚起見，採用標題方式：首列譜主事略，次列當代有關人物，最後為當代有關大事。

一、無事可系之年，亦紀其年代、甲子、年歲與當代有關人物、有關大事。

一、本年譜對人的稱呼，除尊稱譜主為先生外，其餘皆「臨文不諱」，直稱姓名；凡不知名

的，称其字、号。案「譜亦史」之例，对当时人都注明他們的字与里居，以便查考檢閱。

一、前人年譜，有的旁行斜上，有的屬联成文，茲采用大字提綱、小字分注的方式，并对譚氏著作精簡取意，擇要摘錄，以見其思想的內容一般与变迁沿革。

一、論世然后可以知人，年譜虽不能詳載国家大事，然而自譚氏出生一直到殉难，这三十三年間正是国际国内大震蕩的时代，国际国内阶级关系極其复杂的时代，何况一切思想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都是适应于社会經濟的發展与政治斗争的。要了解譚氏具有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學說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就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存在，因而不能不附录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从时代形势賦与譚氏思想中的特点，借此可以看出譚氏思想所反映的社会时代的特点。故本年譜对于当时国家有关大事，亦擇要按年分別附記，以与譜主生平相照应。

一、譚嗣同一生事迹，以变法为主，亦最繁賾。然戊戌变法的形成：一方面系抵抗帝国主义政治、軍事、經濟侵略，企圖挽救甲午战后中国瓜分的危机；一方面系反对在西方侵略者支持下挂着「自强求富」的名义而实质上是維持垂死的封建統治镇压人民起义与阻碍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加速中国殖民地化买办化的「洋务运动」。不过由于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商品傾銷与后

来的資本輸出，以及洋务运动开办的新式企業，虽加深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質，但客觀上也刺激了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尤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結在一起所表現的「洋务运动」的發生、破產，使中国資本主义有所發展，待洋务运动完全崩潰，而戊戌变法也随之而展开了。故本年譜有关于帝国主义經濟侵略，洋务运动开展情况以及变法維新經過的犖犖大端，亦擇要附录。

一、譚氏的思想固然有其物質基础，但思想和社会發展的过程一样，也有着它的發展过程，思想的發展正反映着社会的發展。譚氏和当时許多先进的中国人士一样，匆遽地在中外古今各家各派的思想學說中尽量找寻适合自己需要的理論武器。因之譚氏的思想淵源可謂極五花八門龐雜之至：如繼承了十九世紀中期以来作为地主階級中反对派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的「今文經學」，而使他成为「公羊巨子」；如他「尝尽讀所謂格致类之譯書」，又从那些到中国来活动的傳教士中获得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一部份社会科学的知識；又受到十七世紀啓蒙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以及从中国傳統學術中，大乘佛教中，吸取以适合于自己需要的东西。故本年譜对于今文学家，維新运动前导思想家，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國傳教士的活动概況亦擇要附录。

一、研究譚氏的學說思想，以其所著「仁學」為主要根據。為了剝落譚氏哲學思想中神秘的外衣，恰當地指出其若干唯物主義的成份，從階級基礎上對「仁學」進步一面和落后一面的思想內容略作分析、批判、說明。雖然目前對譚氏哲學思想的估價，存在着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譚氏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一種認為基本上是唯心主義，尚未獲得正確的結論。但由於譚氏所處的當時中國的历史情況和其階級地位的局限使然，不可能完全是個純粹的唯物主義的，其中必然夾雜着唯心主義的毒素，似應從譚氏的主要傾向而言，廷福認為還是唯物主義的。至於為什麼說譚氏的哲學思想是唯物主義的？不在本年譜範圍之內，俟另外專論之。

一、譚氏一生交游廣泛，而這許多師友于其思想和活動亦有一定的影響。故本譜于譚氏的師友與當時有关人物的生歿，亦擇要記敘，并概括的作一介紹。

一、譚氏的詩文，大都沒有著作的年月，凡其集中有年有月可考的，都分年編注；那些沒有年月的，如有旁證可稽，也都按年排比。

一、清代系用陰曆紀岁时，故本年譜亦以陰曆計时，以存其真，為考查方便計，參照中西历对照表，并注明陽历月日。

譚嗣同年譜

一〇

一、譚氏生平与变法相始終，三十三年間，国事大端尤多，而譚氏的全集复不完全，故本年譜采摭所及，难免疏漏舛誤，深祈譚氏的亲戚故旧，以及海内学者不吝賜教，惠予指示，以便他日增补或訂正，尤所感禱。

楊廷福 一九五六年四月

年譜前編

生平簡历

譚嗣同字复生，譚嗣同全集〔三十自紀〕，号壮飞，自紀十一号华相众牛，自叙「一号东海寒冥氏」。自紀三十先生六世祖逢琪，明末从长沙徙至浏陽定居，遂世代为浏陽人。浏陽产菊花，石其質地「温而縝，野而文，复生謂已其影，名石菊影子廬」。自紀又以陶詩「远我遺世情」之言，名堂曰「远遺堂」。石菊影子廬筆識「思篇」四十一

先生早年穎慧，十岁时从浏陽學者歐陽中鵠学，勤于學問的探討研究，于經、史、詞、賦、訓詁之學外，对于佛學、神學、基督教義亦無不精研，而于政治、軍事、哲學、天文、历数、理化諸學，也曾化过一翻功夫。少年时尤其好今文經學，称贊魏源、龔自珍，又喜讀張載「正蒙」与王夫之「船山遺書」，在思想方面，受其影响。其治学「以日新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梁啓超：「譚嗣同傳」性任俠，并能技击劍术。一八七七年随父至甘肃任所，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九年五度往返于兰州长沙之間，自紀二十岁游新疆巡撫刘錦棠之幕，大見称許，嘆

为奇才。自是十年中，往来南北各省，「然行既万有余里矣。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繞地球一周」。^{〔三〕}「^{自紀}考察風土，結交豪杰，^{梁啓超}，^{譚嗣同傳}」以天下为己任。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六赴南北省試，皆名落孙山。先生受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志益憤發，思想更有急遽的轉變，而竭力提倡新政。一八九五年为着拜訪当时变法維新的先进的康有为，先生北游京师，自称爲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一八九六年始以同知入資为江苏候補知府。一八九七年应湖南巡撫陈宝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創辦新政：創設內河小輪、商办矿务、湘粵鐵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衛局，使湖南的近代物質和近代文化，有着显著的进步；又創設南学会，研究变法的理論，設計变法的方案，为全省新政的命脉，和北京的保国会遙相呼应；并努力于結集变法同志，在維新事業的策动上，尽过最大的努力。一八九八年四月，載湉定国是的詔書頒下，先生以徐致靖的保荐，自候补知府权充四品軍机章京。可是在頑固守旧派的陰謀破坏下，遂發生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的政变，先生于初十日（九月二十五日）被逮捕，十三日（九月二十八日）殉难于北京菜市口刑場，享年三十四岁。^{实足年齡三十三岁}翌年迁葬于浏陽城外石山下。著有「仁学」二卷、「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远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石菊影廬筆識」二卷、「仲叔四書义」一卷、「謚考前編」二卷、「浏陽譚氏譜」四卷、「秋雨年华之館从臾

書「四卷」、「興算學議」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思緯壹壹台短書」一卷、「印錄」一卷、「筭記」一卷、「劍經衍葛」一卷、「諡考正編今編」、「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王志」、「楚天涼兩軒怀人錄」、「洵陽三先生弟子著錄」、「寸碧岑樓玩物小記」、「緯學」（無卷數）、「史例」等。其中「史例」未脫稿，有序見于集中，「諡考正編今編」、「洵陽三先生弟子著錄」、「王志」、「寸碧岑樓玩物小記」均未脫稿。

家世和家庭

譚嗣同家世，根据「洵陽譚氏譜」和「洵陽縣志」，仅上溯到北宋靖康末年（一一二七年）为止。始祖譚孝成，因避金兵的侵略，才从原居的江南西路洪州新建縣樵舍，南迁到福建路汀县长汀县。在长汀住了二代，傳到譚承新一代再迁到清流县，十四世傳到譚功安时，徙至湖南长沙县，在长沙住了三代，至譚逢琪时，从长沙迁到洵陽縣定居，遂为洵陽人。「洵陽譚氏譜叙例」

譚氏祖先在福建清流县，于南宋一百五十年間已經傳了八世，到譚啓寰时，在宋末随从主管殿前司苏刘义出师抵抗元兵的侵略，水战中陣亡，后世就以軍功显，「啓寰府君家傳」譚嗣同就是他二十世的族孙。又傳至譚淵，字溥泉，号时菴，承繼他父亲如嵩副千戶的职位，驍勇善战，从朱